

文艺观潮

## 汲取源头活水,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

□ 于文秀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文艺工作者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史诗是人民创造的,不论多么宏大的创作,多么高的立意追求,都必须从最真实的生活出发,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中发现崇高,从而深刻提炼生活、生动表达生活、全景展现生活。

任何时代,史诗从来都是文艺创作应有的最高追求,也是文学价值经典性的体现。在快节奏、娱乐化、碎片化的消费文化语境下,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往往不再追求史诗性,甚至以消解史诗性为前卫,取而代之的是专注于日常书写“小长篇”。不可否认,小长篇中确有很多优秀作品,但也不乏为凑篇幅而以技巧拉伸或内容注水现象,以致出现评论者所说的“时代之重与写作之轻”的不对称感。纵观历史,能经得起淘洗和冲刷的流传之作,或气象宏阔,或精神深邃,它们构成了文明的精华和文化的经典。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作家、艺术家不能总是深居在书房里,不能总深陷在文本中,更不能脱离中华文化之根和远离丰富的民间生

活。只有不断汲取传统与民间的源头活水,才能书写出高质量的史诗之作。

高尔基曾说:“各国伟大诗人的优秀作品都是取材于民间集体创作的宝藏,自古以来这个宝藏就曾提供了一切富于诗意的概括、一切有名的形象和典型。”的确,文学艺术中的优秀之作,都蕴含着丰厚的民族文化精髓,都是文化传统与民间文化的承载。民族性不仅是文学的重要精神资源,而且是身份标识,是其独特性、创造性的体现。

民间文学资源是文艺创作的资源库、素材库,并给予创作以灵感和启示。从中国文学演进和嬗变过程看,很多文类与体裁的出现和繁荣,都可追溯到广阔的民间。如《离骚》《九歌》等作品与民间祭祀歌谣密不可分,传奇小说受到口耳相传的俗讲和变文的影响。而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大禹治水、嫦娥奔月、鹊桥相会等瑰丽的文化遗产,构成了中国人独有的创造与想象,也沉淀为民族的原型意象与潜隐结构。

民间文学所蕴含的文化精神、思想内涵、美学价值乃至语言艺术,是民族文艺的立身之本、生机所在。别林斯基评价民间文化对于果戈理文学成就的意义时指出:“如此可爱的托名为养蜂人的果戈理,是一位非凡的天才。谁不知道

他的《狄康卡近乡夜话》?这里面对多少机智、乐趣、诗意和人民性!”其实,果戈理的成功并非因为他具有什么“非凡的天才”,而是他植根于乌克兰民间文化沃土,体现的是民间艺术的伟大和丰饶。

很多优秀作家的成功也表征了民间文化的决定性作用。汪曾祺多次表达民间文化对于创作的意义:“我觉得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我们要‘以故为新’,从遗产中找出新的东西来……特别是民间文学,那真是一个宝库。我甚至可以武断地说,不读一点民歌和民间故事,是不能成为一个好小说家的。”贾平凹在谈创作体会时也强调作品要有现代性、传统性和民间性。莫言提出作家要“大踏步后退”到民族传统。他们的不少作品,深植于文化传统,浸润了民间滋养。

文艺创作与生活、时代的关系,永远是作家、艺术家要正视的第一要务。文学艺术要与时代同频共振,作家、艺术家要做时代的发现者和感知者,要用开阔的视野、深邃的思想统摄时代的变迁、心灵的悸动,感应时代的召唤,完成为时代而歌、为人民抒怀的文学使命。

1991年5月,巴金在写给全国青年作家会议的贺词中说:“用心写作,将心交给读者。巴金的这句话,饱含他对文学和读者的

深切挚爱,至今听来依然心潮澎湃。的确,要想创作出经典的史诗之作,需要创作的勇气、智慧和创造力,更需要真诚地思索、真诚地回归生活。文学创作不是纯粹的智力活动,不能脱离生活,应该有力戒浮躁,一头扎入生活。故事可以编,生活不能编。路遥的文学道路对于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为了写《平凡的世界》这部长篇小说,他专门提前准备了两三年时间,深入生活,实地采访,观察各阶层人群的日常生活细节,翻阅报纸文献潜入历史,克服各种困难,忍受各种痛苦,孤独地行进在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以热烈的情怀,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付出了当代文学的名篇巨著。《平凡的世界》出版以来,年年加印,经久不衰,至今仍在中国图书畅销榜上名列前茅。路遥怀着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感动情而真诚地书写了时代变迁、不同人的命运及青年一代的人生奋斗,《平凡的世界》称得上是一部中国城乡社会改革的历史画卷和时代史诗。这部作品的成功,印证了歌德关于经典的民族作家产生的论述:“他在他的民族历史中碰上了伟大事件及其后果的幸运的有意义的统一;他在他的同胞的思想中抓住了伟大处,在他们的情感中抓住了深刻处,在他们的行动中抓住了

坚强和融贯一致处;他自己完全被民族精神渗透了,由于内在的天才,自觉对过去和现在都能同情共鸣……”

一个时代文艺创作的高度,取决于优秀与经典之作的多寡。而优秀与经典之作取决于作家、艺术家的才华与追求。只有拿出“十年磨一剑”的精神,耐得住寂寞与清苦才能创作出史诗性之作。眼下的文艺创作存在质与量之间的严重背离与不均衡。有人说,这是一个长篇狂欢的时代,一切似乎都以长为美,以快为佳。这不计其数的海量作品,能够成为经典的寥寥无几。有的作家不是几年创作一部长篇小说,而是一年写两三部,这当然与以利润思维碾压审美取向的商业逻辑和眼球经济直接相关,在频频“露脸”“出境”来刷存在感

的时代风气下,作家艺术家们唯恐自己被迫边缘化、被淡忘,不得不随波逐流。不讲质量,只讲数量,不求品位,只求长度,注定难以产生精品。

精品的打造和淬炼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做到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缺少伟大的作品,没有史诗之作的产生,这不仅是文艺界的遗憾,也是时代的缺憾。要深刻认识到,史诗之作不仅是民族文化的柱石,也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支撑。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教授)

深植于文化传统,浸润了民间滋养。

一个时代文艺创作的高度,取决于优秀与经典之作的多寡。而优秀与经典之作取决于作家、艺术家的才华与追求。只有拿出“十年磨一剑”的精神,耐得住寂寞与清苦才能创作出史诗性之作。眼下的文艺创作存在质与量之间的严重背离与不均衡。有人说,这是一个长篇狂欢的时代,一切似乎都以长为美,以快为佳。这不计其数的海量作品,能够成为经典的寥寥无几。有的作家不是几年创作一部长篇小说,而是一年写两三部,这当然与以利润思维碾压审美取向的商业逻辑和眼球经济直接相关,在频频“露脸”“出境”来刷存在感

的时代风气下,作家艺术家们唯恐自己被迫边缘化、被淡忘,不得不随波逐流。不讲质量,只讲数量,不求品位,只求长度,注定难以产生精品。

精品的打造和淬炼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做到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缺少伟大的作品,没有史诗之作的产生,这不仅是文艺界的遗憾,也是时代的缺憾。要深刻认识到,史诗之作不仅是民族文化的柱石,也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支撑。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教授)

## 诗在山水间

□ 李 裴

中国文化的文学境界,蕴藏着中华民族思想、人生的根柢,从《诗经》《楚辞》《元曲》《明清小说》……而其发轫者,非《诗经》莫属。这是华夏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华文化生长的一个重要根源。我在《追逐生命的火焰——梅尔诗的一种文本解读》中写道:以“诗”为“经”,“关关雉鸣,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生命的萌动开篇,是人类历史总结的大智慧。只要人类还存在,只要生命还在延续,诗歌之花就一定灿烂。诗人从宇宙洪荒与自然景观的混沌中窥见了生命的秘密,在无机物与无机物的融合中窥见了生命的真谛。

诗的目的何在?众说纷纭,而其中“诗言志”“兴观群怨”“不学诗,无以言”,有广泛的基础。进一步,则如孔子教导子贡的,“告诸往而知来者”。一“往”一“来”,倒也是诗的精神之精妙内涵所在。诚圣人言也。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是要解决思想、精神、价值等问题。

这个标准和坐标在哪里呢?庄子宣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空间、时间、周边的一切,都是可取可不说的。而从诗歌“风、雅、颂”“赋、比、兴”看来,理解“文史、文哲、文政”一体化的文化底蕴,深入“做人”与“做文”的深刻思辨,通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体悟,似可理会“诗心”之所依。

在中华文化体系里,儒家侧重于解决人与人的问题,道家侧重于解决人与自身的问题,而佛家则侧重于解决人与内心的问题。“三家”皆博大精深,自有其说,浩浩荡荡,数千年不绝。对于诗歌创作、诗歌作品,动观之,一时代有一时代之诗学;静观之,翠竹黄花,清池皓月,诗性盎然。溯源至极,恐怕诗人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可以成为延展性最强的一个答案。

疑问总是存在,争辩也不可能停歇。“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追问始终牵扯着人们的思绪。喧嚣之后终将走向何处?诗人杜甫断言:“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山水的力量是最强大的,融入其中,即使沧海桑田,其支撑内核也将明亮不坠,正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诗人李发横说,与山水交友不累,与草木谈心最真。这是“诗意的微笑”。“那山水与我们有缘”,这是一种归宿。诗在山水间,让我们行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 凝视故乡,发现蓬勃之美

——从邢小俊的《拂掌大地》说开去

□ 刘玉琴

世间宏阔深邃的基因和密码,都无声地隐藏于土地;匍匐在土地之上的人是神奇的解密者。与土地与农人对话,是人类最深邃的哲学命题。世界上唯有土地永恒,与明天同在,并追问揭示着人类从哪里来,将去何方。

作家邢小俊《拂掌大地》(作家出版社出版)以渭北高原陕西铜川耀州区为原型,以正、反、合三个篇章,以鲜活的时代性、深沉的思考性,展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中国新农村的蓬勃图景。作品中的让礼村,是泾渭流域典型的农业村社。它是耀州区乃至铜川地区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的缩影。20世纪30年代,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创建了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今天,在培育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之地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变化,是对当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正确的形象证明。作者以新闻捕捉能力和文学描述功力,展示了时代的进步,揭示了进步的根由。在邢小俊的笔下,当下的村庄日益鲜活立体。他在凡俗的生活中发现并提炼出力量和美,又把村庄的劳动、生活、人文、季节、生老病死搬进文字,对乡村进行充满诗意的呈现。新闻的敏锐判断与文学的雅致凝练,呈现了一个新农村代表性村庄的历史韵味和现实意义。作品的独特价值,正在于新闻和文学有机结合而产生的新图景。

与广大农村一样,由于时代变迁,让礼村暮霭升起,倦鸟归巢的景象早已渐行渐远。而正如人类来自黄土,终将还要回归黄土一样,乡村,以一种完美的姿态,又终于在岁月流变中翻转成一道耀眼风景。更重要的是,曾经伴随着庄稼野草朴素生长,依然鲜活流淌,在果木葳蕤中升华成新的吟唱。作者平实、优雅地书写了乡村振兴的可喜变化,

透露出乡村社会的美好愿景,体现了文学对现实的深刻投影和作家的使命担当。

看多了乡村萧条衰败的书写,我们在内心里时常翻动着田园诗意的审美。去不复的忧伤。而这部作品,以别致的视角,对乡村进行了一次走出和返回的深度扫描,真实可信,令人感动。“中国在骨子里是个农业国家,充满农耕文明的诗意审美。正如在让礼村,劳动应和时令,情感率性真切,对天地人从容淳朴,一句老腔就能唱醉一个个鲜活的心灵。让礼村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村庄,还是情感意义上的故乡。所以,虽然时代巨变,社会不断发展,人们离开故土,在异乡漂泊,但是,农村,田野,泥土的芬芳,青草的味道,大自然深情的呼吸,都在每一个远走他乡的人身体里悄悄地收藏。

作者的超越之处,在于对现实有深切关注,又对未来抱有坚定希望。他发现生活之依然欣欣向前,乡村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田野上,有逐渐回归聚拢的田心,大地上,人们的生存形态和生活方式正被重新定义。今天的农村,让人有越来越多的新鲜感受,它曾经是并将持续是人们心灵打开、将平、安放的空间。相对于当下许多习惯于正确与急切叙事、缺乏耐心观察与剖析的作品,邢小俊对新时代的巨变和农民的精神风貌,有着真诚广博的思考。他善于从实际生活中捕获灵感,有独到的发现。乡村的振兴,是走出乡村的人们回过头来,对乡村价值的重新认识。振兴的乡村,应该是传统与发展相融合,仁德有序,道德圆满,身心皆可安居的村落。作者的笔下,乡村既接续时空,传承文化,又负载情感,展示变迁,这是对农村和生命永恒简单而朴素的深刻揭示。

整体而言,作品结构精巧,语言形象,情绪饱满,文字



让礼村里的耄耋老人们都用上了手机,有了自己的微信群。  
王铁林/绘 选自《拂掌大地》

凝练,欢乐与悲伤、乡愁与希望的交织勾描,使让礼村具有了普遍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作者为文学的现实题材创作带来的启示是:作家要有匍匐于大地的虔诚之姿,真挚而又心甘情愿地接纳来自大地的粗糙与坚硬,从中获取几千年土地深耕细作后散发出的深情呼吸;作家要有超拔之志,以重新构建生活的勇气,提纯平凡琐碎却又富有诗意的生活,让真实的场景及活动场景中的人,艺术地行走在大地上,让他们的劳动与创造闪烁着时代精神的光芒;作家要有捕捉思考新的生活之变的能力,除去浮云遮眼的尘土,敏锐发现生活中渐成趋势的蓬勃新美,书写真实的生态和简单清洁的生活,探索社会进步,展示时代的发展脉络。一部作品要有温度、有深度,有道德、有情怀,与作家的前倾姿态、敏锐发现、哲理思索紧密相连。

身处伟大变革的时代,各种观念激烈碰撞,新的理念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小说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小说向西方学习,另起炉灶。到了20世纪80年代,再次掀起向西方小说学习的浪潮,各种先锋的文学实验纷纷登场。今天,当后现代写作的叙事实验越来越难以走出小众化的怪圈,回到中国小说传统的声音不时响起。那么,中国小说到底有哪些有别于西方的传统?

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课题。中国小说在演进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叙事传统,比如说潜在的“四季结构”。西方文学中的长篇虚构叙事,从史诗发展而来,因此非常重视叙述一个完整的事件,即叙述一个开头、发展、结尾过程俱全的故事。“结构的完整性”往往成为评价一部西方长篇小说的标准。中国小说也注重讲故事,但往往不是紧紧围绕着小说主人公,包含了故事的发展和高潮的严密的叙事结构,而是在故事的结构之外,常常还有另一重潜在的结构,比如明清长篇小说中的“四季”,或者说“季节的转换”。

以《红楼梦》为例,“四季”具有对应人物、家族命运的情感事功,同时小说虽然以宝黛的情感发展线索重点写了几大事件,但还有一个潜在的结构,便是“季节的转换”。在此基础上,写庆寿、看戏、结社、消夏、过冬,以及一应的服饰、食物。一部《红楼梦》,不过写几年的春去秋来,便写出了中国人“恒常”的人生与面对自然的心灵世界。而在这“恒常”的底色之上,作者写出世事、命运的“无常”,增加了悲剧感。

可以说,“四季”的结构方式是中国小说对小说结构的独特贡献,深具启发意义。而“四季”的结构方式相对应的则是中国小说在讲故事之外的“非叙事性”,常常描写“无事之构成”。再加上大量抒情诗的运用,构成了西方小说传统重视叙事过程、注重“结构完整性”的标准大异其趣的景观。

“四季”这一潜在的结构方式很少受到当代写作者的重视。“四季”代表的是“日常”“恒常”,代表一种自然、复沓之美,代表编织其中的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而当下的一些小说,具体的故事情节背后,往往是时代的背景和宏大的思想框架,与“四季”的旨趣相去甚远。而先锋浪潮中,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的文学技巧轮番上演,小说的主体不再是故事、人物,有时甚至只是叙事行为,更是与之南辕北辙。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一批能够自觉融合中国小说传统和域外小说经验的成熟作品。张爱玲的长篇小说《半生缘》是其中的代表。这部小说故事情节套用美国作家马塞德的小说《晋汉先生》,但故事框架却继承了《红楼梦》的小说传统,运用“四季”结构,填上细密、真切

另外,中国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中常常使用对话来表现人物,通过语言使人物的个性鲜活生动、跃然纸上,使活甚至用来表现故事。美国汉学家满安迪观察到,中国的主流文学,“言”往往重于“事”,“事”常常被“非事”打断。也就是说,西方文学更重“事”,小说注重描写事件的发展过程。而中国小说,往往对人物的语言投入更大的关注。我们对中国小说中的某个人物印象深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语言使他成为一个活灵活现、神情毕肖的个人,所谓“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注重人物的语言,重视说话人的“声口”,以语言来表现人,是中国小说的又一个优秀传统。金圣叹评《水浒传》的好处,认为“《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胡适赞美《海上花列传》,说这是“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认为这部作品的长处在于“语言的传神,描写的细致,同每一故事的自然地发展;读时耐人仔细玩味,读过之后令人感觉深刻的印象与悠然不尽的余韵”。其中,人物“语言的传神”是胡适认定这部作品为杰作的重要依据。老舍称赞曹雪芹,也说他笔下的人物,都说地道的北京话,却极具个性,“凭空给世界创造出许多不朽的人物”。

现代文学的不少优秀之作保留了中国小说传统的影响,重视小说人物的“声口”,注意表现说话人的神情口气,从而塑造了很多典型的人物。老舍就受传统小说影响很深。他的小说结构,“不取中国小说

□ 王晶晶

的形式”,而借鉴以狄更斯为代表的西方小说;但他笔下人物的语言,却是极生动活泼的口语。虎妞的语言,刻画出一个既泼辣能干,又“像老嫂子疼爱小叔子”一样爱样子的女性典型,而祥子嘴里蹦出来的每个字都对塑造这个闷头闷脑、淳朴、老实的车夫形象起到了关键作用。老舍特别擅长用简明浅白的口语塑造生动有力的人物形象,正是受到了中国小说高度重视人物“声口”的叙事传统的影响。对此,老舍有着高度的自觉和积极的思考,他在《文学创作与语言》一文中写道:“我们的语言在世界上是以简练著称的。简而明,这是我们语言的特色。”

整体而言,随着各种叙事技巧的花样翻新,当代小说家普遍放弃了以“声口”塑造人物的方法。小说家们更注重“叙事”,而非通过贴合人物个性的语言来塑造人物。在众多拖沓冗长的小说中,我们很难因为精神有力、生动形象的人物语言,对某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产生深刻的印象。小说人物大多数面目模糊浮泛,和他们说着雷同的、没有个性的语言难脱干系。相反,倒是莫言《透明的红萝卜》里不著一词的黑孩,比起很多小说中言语无味的人物给读者带来更大震动,令人难以忘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反讽。

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大致呈现出两个趋向,一是模仿西方的小说技巧,一是网络化的快速写作。对于认真探索小说艺术的写作者们来说,西方的小说技巧固然值得借鉴,但写好人物语言、仔细揣摩人物“声口”,或许也是我们不该放弃的并未远去的小说传统。

中国小说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老舍、张爱玲、沈从文等现代作家融合中国小说传统与西方叙事经验的写作,已经成为中国小说传统的一部分。传统需要更新、生长与创造,传统正是在与创新错综复杂、自然而然的结合在一起时,才得以延续的。正如老舍所说,“旧文化的不死,全仗着新文化的输入”。

当代小说创作仍然过于依赖西方经验,甚至“小说的评价标准也完全是西化的”。正是在这个语境下,文坛出现了“回到中国小说传统”的呼声。而“好的中国小说”这一概念的提出,则集中体现了对“中国小说传统当代转化”的思考。

评论家周明全认为,尽管必须开眼看世界,但用中文写外国小说是可悲的。必须摆脱对西方经验的被动依赖,返回到中国经验的“原乡”。好的中国小说,来源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生活,是我们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提出“好的中国小说”应该具有故事好、人物典型、个性突出、语言优美有力等要素,具有历史感、经典性、诗性美、朴拙美、浑然美等美学特征。这是对“中国小说传统在当下创新与转化的理论探索”。

中国小说传统,应该得到不断的发掘、继承和发扬。中国小说唯有继承发扬自身的传统,才有可能产生世界性的优秀小说作品。正如昆德拉所说的,“伟大的作品只能诞生于它们所属艺术的历史中,同时参与这个历史”。

(作者系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